

GUANCHANGDARENZENGGUOFAN

官场达人 曾国藩

这不是曾国藩家书，而是比家书更浅显易学的处世宝典！

想知道农家孩子曾国藩怎样摇身一变，
成为无人能及的“大清圣哲”、济世忠臣吗？

本书将会为你细细剖析其中玄机奥秘，
看破世态人情，指点成败之机！



王志刚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官场达人

——曾国藩——

王志刚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场达人曾国藩 / 王志刚编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99-4753-2

I. ①官… II. ①王…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 人物评论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8960 号

书 名 官场达人曾国藩

编 著 者 王志刚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753-2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曾国藩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他影响了几代人，人们至今仍然对其顶礼膜拜。很多名人都对他推崇备至。梁启超说：“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年轻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做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捧读不辍。

的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尤其是他独到的思想见解，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五千年智慧的独到感悟，而且这些见解是他历经官场、战场磨难之后提炼出来的，不空洞、不浮夸，有积极的实用价值。

曾国藩一生官至总督，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曾国藩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实际是慈禧太后）三代君王，历时 34 年。

曾国藩与三代君王打交道颇费心机，有时奴颜媚骨；有时抗旨犯上；有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为对方是一言九鼎的皇上。封建社会，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落入昏君或无能之帝的手中，很多人就要遭殃。曾国藩所侍奉的三代君王虽不是昏君，却是无能之帝，事实上皇上可以无能，但是他却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无能。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三代君王打交道的！

曾国藩为官始终铭记“忠”字，尤其是他同太平天国的斗争。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出身、学历一样，都是秀才，同属清朝道光年间。但二人的结局不同，一个得第进京；另一个不得志，扯旗造反，结果一呼百应，一路东进北上，势如破竹。为满清打江山的八旗兵已不堪一击，满朝文武大臣束手无策，于是曾国藩以书生身份带兵，同太平天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历经十多年的腥风血雨，曾国藩终于成功了，内圣外王，名满天下；洪秀全失败了，兵败、身亡、国灭。

曾国藩在晚清政治舞台活动三十年，结交了一大批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朋友贤否，关乎一生之成败”。在这些朋友当中，有的是和他并肩作战的同僚幕友，有的是他诗词答和的文友，尤其是他积极提携的后辈，更是他事业上的左膀右臂，以至于这些人在后来的满清官场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曾国藩一生三变，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主张，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人之气质，本是天生，很难改变，唯有读书可以改变！”曾国藩的这种变，都是围绕着自己官场、人生的感悟和心得进行的，是他洞悉官场后的大彻大悟。曾国藩由最初入仕时的张扬变得谨慎，以至于到了如履薄冰的地步；由最初的百炼钢变成了绕指柔，这种变是他性格上的彻底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晚清王朝的帝王对他消除戒心。

平心而论，曾国藩没有辜负晚清王朝给他的高官厚禄，每每在关键时刻，他都能挺身而出，对自己负责，对满清皇室负责，对全天下负责。不管是与太平天国作战，还是与捻军对阵，乃至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都义无反顾，这也是他赢得满清统治者信赖的首要条件。

曾国藩是学者型封建官僚，为官同时不忘著书，他的家书、日记、信札时至今日还广泛流传。百年以后，细细品读曾国藩的作品，还能领会到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的精华，这足以说明他的思想意义具有积极进步、科学实用的价值。

总之，曾国藩的思想谋略精华远不止这些，他的一生是一部全方位、多视角的成功学全书，值得后人品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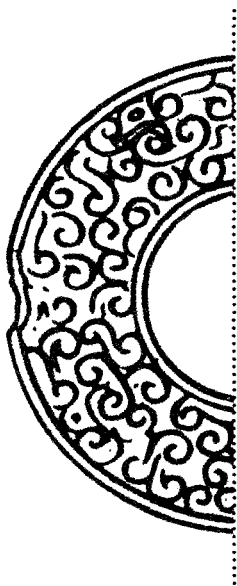
前言/001

第一章 立志做济世忠臣,决心成一番大事/001

1. 少年立志,以天下大事为己任/001
2. 目击时弊,敢于直言进谏/004
3. 爱民体国,勤俭为官/008
4. 公而忘私,先有国后有家/013
5. 顾大局息事宁人/014
6. 天道酬勤,勤可成事/016
7. 积极进取无不成之事/020
8. 立志当坚,持之以恒/021

第二章 广交天下英才,提携有后辈/026

1. 找有能力的贵人帮助自己/026
2. 选择志同道合的人做朋友/028
3. 和有抱负的贤人联姻结亲/032
4. 学习朋友优点,举荐贤人入仕/035
5. 推功让贤使事业发扬光大/040
6. 交友要交谏友/041
7. 交友贵专一,交友要交心/043
8. 谦恭忍让,别把朋友变敌人/045
9. 见贤思齐,赢得朋友/048
10. 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049
11. 认真甄选人才/053
12. 培养有为才俊,严惩害群之马/055
13. 对悍将软硬兼施,恩威并重/059



第三章 勇于担大任,敢于打硬仗/061

1. 危急之际,只有自己最可靠/061
2. 以坚忍来应对困境/065
3. 国有危难,舍身轻利/071
4. 强敌当前,勇而无惧/076
5. 大敌当前,为国平乱、为主分忧/077
6. 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080

第四章 如履薄冰为官,小心谨慎带兵/082

1. 为官者牢记“谨慎”二字/082
2. 隐蔽锋芒可避免灾祸/086
3. 自剪羽翼,消除朝廷的疑虑/090
4. 昏庸、傲慢、贪鄙、狡诈是为官者的大忌/093
5. 为官不能凭一己之好恶行事/095
6. 居官不败的三大铁律/096
7. 戒除官场的三种恶习/097
8. 裁军不辞官,避免嫌疑/100
9. 局势动荡时要谨慎应对/104

第五章 言行低调自律,避免张扬贪名/109

1. 言多必失,小心祸从口出/109
2. 骄纵迟早出事,谨慎永保太平/112
3. 切勿一味愚忠,灵活应对主上/113
4. 巧装糊涂,以“浑”字入世/118
5. 识人、用人须以“慎”为先/120
6. 凡事轻名利、重谦让/122
7. 抱残守缺乃最高境界/126
8. 慎独可戒虚妄/130
9. 万万不可有傲气/133

第六章 刚柔是做人之本,屈伸为处世之技/137

1. 忍辱耐烦,忍住难忍之事/137

2. 刚柔相济是成大事的根本/139
3. 羽翼未丰,不可轻举妄动/142
4. 忍无可忍时要还以颜色/144
5. 屈伸有度,灵活应对多变局势/146
6.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150
7. 筹建淮军,增强实力/153
8. 刚柔互用亦是自立之道/155
9. 以耐烦应事,不伎不求/158

第七章 教育子弟,提倡先进学习思想/161

1. 读书求变,变则生智/161
2. 留学活动开眼界/163
3. 学有所长,专精有突破/166
4. 能者为师,学以致用/168
5. 读书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172
6. 言传身教皆有之/178
7. 耕读传家是立身之本/182
8. 莫存代代做官之想/186
9. 以和持家,和顺致祥/190

第八章 下功夫修养心身/193

1. 自我修养三部曲/193
2. 静以修身,不变中看万变/196
3. 俭以养德,贫而自强/200
4. 戒除恶习,克服弱点/203
5. 勇于改过,不断自省/208
6. 处世四忌:妄言、自大、非议、计较/211
7. 谦是为官之道、立身之本/214
8. 待人以恕,宽和得众/216

第一章 立志做济世忠臣，决心成一番大事



在封建社会，如果希望做一名臣，或成就一番大业，除了必须具备过人的学识、能力外，对君主的忠诚也是至关重要的。为官者不仅要有广济天下的志向，更要有良好的修养和恰当的处世态度，这些都是做忠臣、成大事的根本。

1. 少年立志，以天下大事为己任

有这样一句名言叫“有志者，事竟成”。可见志向在一个人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在少年时代就确立了远大的志向，并一如既往地奋斗终生。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朝野瞩目的重臣，也得益于早年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19 世纪的清王朝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前，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早已盛极而衰、危机四伏了。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没落衰败的景象。更令人担心的是，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对所处的困境毫不关心。即使少数有识之士发出了呐



喊,但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士绅、百姓也麻木不仁。在学术界,熟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的思想仍然控制着读书人,文字狱依然让知识分子谨小慎微,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求在四书五经八股诗赋的“故纸堆”里做学问、求功名,对时事不敢过问。道光年间,由于各种危机不断加剧,清政府才逐渐打开言路,学术界的风气逐渐改变,出现了部分关心时局、讨论时事的读书人。

嘉庆十六年,曾国藩生于湖南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此时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的顶峰走向衰败的时期。此时的大清国,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的政治风气也越来越萎靡不振,真正有治国才能的人寥寥无几。这与嘉庆皇帝的好恶和各级官员的逢迎谄谀是分不开的。

《瞑庵杂识》有这样一则记载:当朝的重臣曹振镛晚年权倾朝野,为官之道更是令人“惊叹”。一门生请教做官的秘诀,曹振镛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的确,道光即位以来,官场的风气日见败坏,各级官员以阿谀奉承为能事,正直的人士不为官场所容。有无名氏赋《一剪梅》予以讽刺: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事实也就是如此,曹振镛是道光皇帝最信任倚重的宰相。他不学无术、目光短浅,只知顺应皇上的意思办事,造成了道光一朝多数官员不思进取、敷衍度日的局面。官吏以不负责任、圆滑应付、尸位素餐者居多,真正有用的人才遭到排挤和打击,国势日见衰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和横征暴敛。再加上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黄河决口,淮水泛滥,百姓的生活日见贫困,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清帝国的外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对华侵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使清王朝大量的白银外流。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的



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而且愈演愈烈。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处于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乱世”，一个政治腐败黑暗、经济贫困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西方列强加深侵略的“乱世”。

曾国藩对自己所处的时世有清醒的认识。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有强烈的功名心。他的一位同乡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1838年，曾国藩殿试中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考试的规定，三甲进士不能充当翰林，曾国藩深深为此感到耻辱。但曾国藩并没有气馁，反而加倍努力苦读，终于跻身翰林的行列，登上了科举仕途的顶峰。在翰林院居官的十多年间，曾国藩除广泛交结朋友外，仍然勤奋读书，确立了“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志向。为此，曾国藩把自己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有“为国藩篱”的含义。曾国藩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认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意即有为百姓谋求幸福的愿望，有振兴国家、开创事业的壮志。他对自己信心十足，“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的儒家治国安邦的理想成为了曾国藩的人生理想，他时时刻刻提醒磨练自己，时刻准备着为挽救大清王朝的统治挺身而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同时，曾国藩也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理想一定要有不懈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曾国藩熟知历史，认识到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为了建功立业都有力排万难的气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显然，成为一代圣贤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为了实现“匡时救世”的目的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没有甘愿奋斗牺牲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曾国藩有奋发进取的精神，并全身心投入到为实现抱负的奋斗之中，他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有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充分表达了他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2. 目击时弊,敢于直言进谏

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历史上既有邹忌讽齐王纳谏使齐国强盛的美谈,也有比干被剖心处死的悲剧。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四书五经的攻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

1842年到1851年,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坚定他的政治抱负,决心担负挽救清王朝的大任。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愤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究其原因,就是官吏的贪污和残暴。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指出:“今事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及平梧,几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



第二，是非混淆，法度紊乱。

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世道人心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饷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以上所说的情形绝不是偶然的，而且在官僚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严重。

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甚至推过揽功。曾国藩认为这都是人心麻木不仁的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颞颥。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颞颥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严重性。

曾国藩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就连上奏折，希望咸丰皇帝采取果断及时的措施，革除弊政，在政治上进行大的变革。然而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



的是，他递上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清朝的政局仍然在风雨飘摇之中。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清政府派遣军队镇压，结果连连遭到失败。

曾国藩对时局十分关注，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内度身世，即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入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他这样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这样的军队作战能力低下，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将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清王朝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不断从广西前线传来。曾国藩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可谓“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然而，“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他再次上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其主要目的是指出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批判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

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



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

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自食其言、饰非拒谏、刚愎自用而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帝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坚持“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昔尧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曰觉其可憎，佞谀曰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皇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有祁寯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惹得咸丰皇帝大怒，但终归是有惊无险，而且这使他声名鹊起，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为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并命曾国藩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在致弟弟的信中说：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阿



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政治家的抱负和远见在这些话中已经显露得非常清楚明白。

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及此事说：

“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寓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可见，在此次上疏中，曾国藩不仅表明了他的耿耿忠心，也显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见解。

这次上疏对曾国藩个人的政治前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当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时，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用之人去平定叛乱，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颜直谏、希望有所作为的曾国藩。于是一介文臣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终于得到了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

3. 爱民体国，勤俭为官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无论一家一国，克勤克俭都会兴旺富裕起来，而懒惰和追求享乐只会日见衰亡。晚清名臣曾国藩对清王朝和封建君主忠心一片，生活上克勤克俭，为官清廉，勤于政务，堪称为政者的楷模。

曾国藩有这样一种观点：天子处理政务不一定要亲力亲为，但大臣一定要勤勉清廉，“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生勤廉，可谓具体实践了诺言。

“清、慎、勤”三个字自古被视为做官的准则。曾国藩也曾作了三字箴言以自勉。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详细规定自己每天应该处理的事件，并常常在日记中反省督促自己。其中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



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每日应办之事，积阁甚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积压较少。”

曾国藩在身强力壮之时，对幕僚几乎没有什么依赖，“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间，尽管他“精力日减，日光逾退”，仍然“沿此旧习”。在晚年之后，尤其是由直隶总督改任两江总督后，眼睛的视力大大减弱，“看文写字深以为苦”，“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仍然坚持亲自处理重要的政务。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总结了一套处理政事的方法，他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所谓经分就是条分缕析。一般的从政人员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的时候无事可做，忙的时候焦头烂额。当需要同时面对许多事情时，要做到有条不紊，分清主次轻重，分清难易缓急。即使处理一件事情，只要抓住主要的、紧急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就会迎刃而解。运用条分缕析的办事方法，可以使人从容不迫且高效率地处理事情。

所谓纶合就是相互关联。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许多人却看不到或不知道在实践中的运用，办起事来往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导致许多事情处理不当，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在处理一件事情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根据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相互影响做好计划再行动。正如曾国藩所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所谓详思就是详细思考。曾国藩办事非常谨慎，通常是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认为如果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周详的思虑，事情很难办好，甚至出现功亏一篑或满盘皆输的结局。对文官的贪生怕死和武官的鲁莽，曾国藩总是分别反复叮嘱告诫。他还针对不同的情况思考问题。曾国藩有两句话，说：“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情况都考察得清清楚楚，